



Let China turn to Western Market:
Alvin Hamilton and the Development
of China's Trade with North America

让中国重返西方市场

阿尔文·汉密尔顿与中国和北美贸易的发展

李节传 著

71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亨·密尔顿·汉密尔顿与中国和北美贸易的发展

让中国重返西方市场

李节传 著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让中国重返西方市场: 阿尔文·汉密尔顿与中国和北美贸易的拓展/李节传著.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5. 4

ISBN 7-5004-4979-8

I. 让… II. 李… III. ①汉密尔顿—生平事迹②对外贸易—中外关系—史料—北美洲 IV. ①K837.127②F752.77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5)第 018923 号

责任编辑 李 是
责任校对 孙慧香
封面设计 三未舫
技术编辑 张汉林

出版发行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鼓楼西大街甲 158 号 邮 编 100720

电 话 010-84029450(邮购)

网 址 <http://www.csspw.cn>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新魏印刷厂

装 订 广增装订厂

版 次 2005 年 4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5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850 × 1168 毫米 1/32

印 张 11.25

插 页 4

字 数 276 千字

定 价 25.00 元

凡购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图书, 如有质量问题请与本社发行部联系调换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本书由加拿大外交与贸易部“加拿大研究基金”和天津师范大学出版基金共同资助出版

(The publication of the book is made possible partly by the Canadian Studies Grant of Department of External Affairs and International Trade Canada, and partly by the Publishing Fund of Tianjin Normal University)



作者和汉密尔顿先生（2000年10月30日摄于加拿大汉密尔顿先生家中）



作者和汉密尔顿先生与“国际加拿大研究会”科研与公共关系官员
琳达·琼斯女士（2000年10月30日摄于加拿大汉密尔顿先生家中）

献 词

谨以此书献给中国人民最困难时结交的朋友：
前加拿大农业部长阿尔文·汉密尔顿先生

For Aivin Hamilton:

A Great Friend of the Chinese People

序 文

1991—1994年担任加拿大驻中国大使的碧福在一本研究加拿大与中国关系的著作序言中写到：“本书只提到诺尔曼·白求恩，但是中国读者将会第一次看到，把中国与加拿大联系在一起并起了关键作用的其他许多人物。毫无疑问，在这些人物之中，最重要的是切斯特·朗宁，一个事实上把自己的一生都献给了中国人民事业的人物，甚至当在其他国家工作而与中国没有直接关系时，他从来也没有放过任何机会宣传中国，让世界更加了解中国融入现代世界所遇到的巨大挑战。在20世纪60年代，为了替加拿大剩余小麦寻找国外市场，加拿大农业部长阿尔文·汉密尔顿也卷入了中国事务。这个进步保守党人后来发现自己与社会主义分子朗宁一样，（向西方）宣传与中华人民共和国更广泛接触的必要性。不过，是自由党政府总理皮埃尔·特鲁多快刀斩乱麻，解决了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问题。”^①受碧福先生的启示，本书作者对阿尔文·汉密尔顿（Alvin Hamilton, 1912—2004）这位迪芬贝克（J. G. Diefenbaker），进步保守党政府（1957—1963）的农业部长产生了浓厚的兴趣。由中国与加拿大政府交换项目（China-

^① Paul M. Evans and B. Michael Frolic ed., *Reluctant Adversaries: Canada and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University of Toronto Press, 1991. 包义文、付尧乐：《新开端：加拿大与中华人民共和国》中译本序，河南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页。

Canada Scholarship Program) 资助, 本书作者于 2000 年 1 月底来到了加拿大渥太华卡尔顿大学, 研究汉密尔顿先生在 40 年前推动中国—加拿大小麦贸易, 帮助中国重返加拿大与西方市场的事迹。

在冷战年代里, 切斯特·朗宁 (Chester Ronning) 活跃于美国与加拿大边界两边, 呼吁加美两国政府及西方社会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和政府为中国唯一合法的政府。他的行动当时在加美民众中, 特别是在加拿大, 可以说是家喻户晓。近十多年来, 由于中国研究加拿大问题学者的努力, 编著和翻译了许多有关中加关系的著作。因此, 朗宁的名字与事迹也为越来越多的中国读者所了解。可是直到现在, 人们对阿尔文·汉密尔顿这位冷战年代北美的一位非常重要的政治家, 他批评美国对华政策, 主张恢复与中国的关系特别是在促进贸易关系上所做的努力, 却知之不多。其实, 汉密尔顿也像朗宁一样, 为了中国的事业、为促进西方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 特别是通过开创和推动大规模的粮食贸易, 促进恢复对华贸易, 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如果说朗宁主要在政治上, 而汉密尔顿则是在经贸方面帮助中国, 尤其通过帮助中国返回加拿大、美国市场进而重返西方商品市场上发挥了重要作用。殊途同归, 两者都为中国摆脱封锁和孤立而融入国际社会做了许多重要的工作。而且, 汉密尔顿的努力与帮助, 甚至比朗宁更具有实质意义。

在 20 世纪 50 年代初期, 郎宁在评价他与中国人民的另一位加拿大友人切斯特·詹姆斯·恩迪科特 (James Endicot)^① 帮助

① 恩迪科特有一个著名的汉名叫文幼章。他 1946 年 5 月由原来支持国民党转而支持共产党, 自朝鲜战争之后, 猛烈抨击美国对中国的封锁遏制政策, 言辞激烈。当时加拿大总理称他是“共产主义的走卒”, 还准备宣布他有“叛国罪”。1950 年至 1983 年间七次中国访华, 受到中国最高领导人毛泽东和周恩来的接见。恩迪科特去世后还把骨灰撒在中国长江的四川段中。

中国革命和建设事业所起的不同作用时说：“我在里面做工作，你在外面做了工作。”^① 其实，这句话用来比喻他与汉密尔顿在帮助中国时所发挥的不同作用，甚至更贴切些。应该说，为了帮助中国，朗宁在外面做工作，而汉密尔顿“在里面做工作”，即在加拿大政府内部做了大量工作。朗宁虽然不知疲倦地斗争，付出的心血甚至比汉密尔顿还要多，但屡遭严重挫折。可以说，在实际解决两国关系问题上，他并没有起到直接作用。汉密尔顿先生就不同了，他是迪芬贝克进步保守党政府的智囊人物，有人说他是这个政府的“灵魂”，其实际的地位是相当于第一副总理的内阁部长，先是担任北方事务与国家资源部部长，后来调任农业部长。显然，无论在资历，还是在地位上，汉密尔顿都比朗宁重要得多，显赫得多，因而说话就更有分量。因此，在推动加拿大与中国的相互关系上，汉密尔顿所发挥的实际作用比朗宁更大、更重要，甚至起了决定作用。可以说，他为帮助中国所做出的一切努力，都产生了重大效果。

汉密尔顿一手开创的中加小麦贸易具有历史转折意义。在担任加拿大政府的北方事务与国家资源部部长，特别是任农业部长的1960—1963年间，他力排众议，竭力主张出售小麦给中国。为此，甚至不怕丢掉官，以辞职相威胁，迫使迪芬贝克总理最终支持他，违背美国意志，在冷战高峰时期的1961年就大规模地做起与中国的粮食贸易，帮助中国度过三年困难时期。这是新中国与西方一个重要国家的第一个重大贸易项目，是两国恢复贸易关系的开端，因而也是对美国利用经贸封锁中国政策的重大突破。实际上，正是由于有他这么重要的一位政治家和内阁官员的

^① Paul Evans and B. Michael Frolic ed., *Adversaries: Canada and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1991, P. 164. (中译本, 第221页)

推动，加拿大内阁才通过了一系列决议，允许贷款（实为官方贷款）销售粮食给中国，才启动两国的长期小麦贸易；更重要的，也正是由于他的不懈努力，紧随粮食贸易之后，加拿大逐步对中国放开了市场，由土特产品、手工艺品而到纺织品，意味着中国商品打入加拿大市场的开始，中国踏上了重返西方市场的道路。不久，中国与日本之间的贸易、中国与美国之间的贸易，乃至中国与整个西方世界的贸易随后得以重新恢复。

更难能可贵的是，汉密尔顿作为西方特别是北美的一位重要政治家，为改善中国的事业与国际地位，能与朗宁一样，持之以恒、矢志不移地努力。1963年6月加拿大进步保守党在大选中败北，汉密尔顿也因此离开了政府。这就意味着他不能继续利用政府官员的地位帮助中国、推动两国贸易关系了。不过，在1968年以前他仍是加拿大联邦议会议员，经常在议会内批评自由党政府的对华政策。在20世纪60年代中后期，他还同朗宁等人一起，通过发表文章、在大学校园作报告、出席学术会议发表演说，抨击美国侵略越南的战争，反对对中国实行的政治孤立与经济封锁，宣传并极力主张中国与加拿大、美国恢复贸易关系，产生了巨大的影响。^①

1968年，汉密尔顿因失去联邦议会的议席而在政治上完全退休。好在不久（1970年）中国与加拿大两国建立了外交关系。60年代末美国也由尼克松主政而中美关系开始松动。这时，似乎用不着汉密尔顿再为两国的经贸事业而操心，改善关系已是政府分内的事。但是，汉密尔顿却仍继续为中国的事业奔波，直到

^① 汉密尔顿和朗宁曾共同出席美国美中关系全国委员会1969年的“美国与中国”讨论会，见 *Reluctant Adversaries, Canada and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P. 160（中译本，第216页）。

20世纪80年代末期中国已完全改革开放之时。20世纪七八十年代，改革的春风刮遍中国大地，社会主义现代化经济建设才真正步入正常轨道。这时，汉密尔顿也更忙了，乘势而上，从更高层次上帮助中国发展现代化的事业。在推动中加、中美恢复经贸关系后，很快转向了推动双方实现全面的经济合作，说他这时已成为中国政府的顾问也不为过，当时，他已年近8旬。同朗宁一样，汉密尔顿先生也把自己的余生实际献给了中国的事业。

对于朗宁献身于中国的事业，积极推动中加关系，我们容易理解。朗宁出身于传教士家庭，其父老朗宁受美国路德教传教会的派遣，1891年来到中国的湖北樊城，创建了一个传教分会和一所教会学校。切斯特·朗宁就出生在那里，并且是在中国的文化氛围中长大成人。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曾短期回到过加拿大，20年代初又重返中国，在樊城继承父业，当了传教士，度过了青年时代。他生在中国，长在中国，第一语言是汉语，说一口流利的湖北方言，他终生以自己对中国、中国文化与社会传统知之甚深而感到自豪，一向把中国当作他的第三个祖国（另外两个分别是美国与加拿大）。除了历史、文化与社会传统以外，在思想和意识形态方面，朗宁也与中华人民共和国息息相通。20世纪20年代初期重返中国时，正逢中国的大革命，他站在支持革命的立场上。后来中国革命功成，特别是五六十年代，社会主义思潮从中国向世界各地传播。加拿大也不例外，受到了社会主义思潮的熏染。社会主义性质的政党还曾在加拿大西部，例如，在萨斯喀彻温省和阿尔伯塔省长期执政。这时已经回到加拿大的朗宁本人，就是阿尔伯塔省的著名社会民主党人，还曾出任该党的地方组织的领导人。因此，加拿大政府和学术界一向把朗宁视为“社会主义分子”。

可见，朗宁与新中国息息相通，是有渊源和思想基础的。正

是由于家庭、出身、文化和思想上的中国背景，以及与新中国息息相通，朗宁有很厚重的中国情结。他发自内心热爱新中国，有如他深爱另外两个国家美国和加拿大一样，所以自1949年以后，“他一直积极争取把和睦带给他的三个祖国”。同时，正是由于真挚而厚重的中国情结，朗宁才能够勇敢地“扮演了冷战政策掘墓人的角色”，“担负承认中国的事业”，以其后半生，目标专一地宣传中国，批评美国孤立中国的错误。他为促使西方恢复与中国的关系“几乎到了着迷的地步”。有的学者因此把他比喻为《天路历程》里的基督徒，“这位朝圣者曾把使中华人民共和国得到（西方国家的）承认作为自己的使命。”当1979年西方错误的对华政策的始作俑者美国终于与中国建立外交关系时，朗宁才如释重负，悲喜交集地落泪了。^①

可是，阿尔文·汉密尔顿作为加拿大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以前积极推动中加关系的另一位关键人物，也为中国的事业奔走，人们就似乎不太容易理解了。他没有朗宁一样的中国情结，相反，如从出身、思想、文化、传统以及所受教育来看，汉密尔顿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应当是格格不入的；也不像朗宁那样与中国有较深关系的背景。在1961年为小麦贸易涉足中国事务以前，他与中国没有任何关系，甚至没有到过中国。此前，与中国的惟一关系，如果可以称为关系的话，也许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初期参加加拿大皇家空军部队，作为一名教练员曾飞到过中国的南邻缅甸的上空执行飞行任务，或许从那里向北扫视过中国的山川。

显然，汉密尔顿与朗宁背景完全不同，不具备朗宁那种在特殊环境下所养成、使其能够出自本能地为中国事业而献身的中国

^① Paul M. Evans and B. Michael Frolic, *Reluctant Adversaries: Canada and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pp. 162—163. (中译本第219—220页)

情结。但是，是什么使他也能够像朗宁那样为同样的事业积极奋斗呢？特别从 20 世纪 60 年代后期，中加粮食贸易已经稳定发展起来，他仍然执著于推动中国恢复与西方国家的贸易关系。为了扩大中加交往的领域，也像朗宁一样，把中国的主要障碍——美国错误的对华政策作为攻击点，奔走于美国、加拿大边界两边，东西海岸之间，不辞辛苦地宣传中国，批评美国，劝说美国人改弦更张。

汉密尔顿之所以这样做，如碧福大使所说，是出于“物质利益”，主要就是为了解决加拿大的长期以来谷物大量剩余的问题。战后自 1952 年起，加拿大大草原的谷物剩余就以每年约 7 亿蒲式尔的规模增加；50 年代末不仅是个严重的经济问题，还成为一个严重的政治问题。迪芬贝克政府由于打出解决谷物剩余困难的选举纲领和旗号，在 1957 年战胜了执政长达 22 年的自由党。保守党当选后，原本考虑通过加拿大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外交关系，以恢复双边正常贸易，销售小麦，但由于美国艾森豪威尔政府反对，加拿大政府确定发展加拿大与中国的实质关系，即首先开展贸易。汉密尔顿与中国的一切关系都起源于他当农业部长、为处理加拿大剩余小麦而开创中加粮食贸易的事业。正如他的传记作者所说，汉密尔顿贷款向中国销售粮食，“许诺帮助中国人扩大海外市场”，这一承诺“使他与中国结下了长期的关系”，一直持续到今天（指 80 年代末期）。^① 这样，中加小麦贸易与随之而来的两国纺织品贸易，以及中国恢复与西方大国贸易关系的问题，就成为本书最优先研究、论述的重点。

20 世纪 50 年代以来，加拿大西部谷物的严重剩余，以及 50

^① Patrick Kyba, *Alvin: A Biography of the Honorable Alvin Hamilton*, Canadian Plains Research Center, Regina, 1989, P. 168.

年代末中国的粮食危机，使原来严重对立、基本断绝贸易往来的这两个东西方重要国家走到一起。但是，在1960年年底向加拿大购买粮食之前，中国一直实行粮食自力更生政策，当时只为应付粮食危机，并不准备长期购买加拿大的粮食。可是，从1960年底第一笔小麦买卖后，周恩来，中国政府的总理就决定改变传统的粮食自力更生政策，与加拿大签订正式协定，开展长期小麦贸易。这是因为在初期的小麦贸易中，周恩来很快发现通过购买国外的谷物解决粮食安全问题，在政治和经济上有诸多好处，特别有利于打破美国以及苏联对中国的封锁孤立，恢复与加拿大等西方国家的贸易关系，重返世界市场，融入国际社会。

中加粮食贸易确实也起到了这样的作用。粮食贸易开始后，中国大量购买小麦，很快出现严重贸易不平衡的问题。中国以小麦贸易施压，经过谈判以及汉密尔顿的帮助，加拿大除贷款销售小麦外，在严格配额制下逐渐开始了与中国的纺织品贸易。然而，即使有纺织品贸易，也难以平衡小麦造成的中国巨大的贸易逆差。汉密尔顿又帮助中国向海外、主要向拉丁美洲和东南亚市场销售产品，中加小麦贸易就起到了推动中国重返世界市场的作用；特别是1962年中加纺织品贸易的突破，促进中国与日本、法国、英国、荷兰等国的新设备和新技术的贸易。这样，中国基本上就打破了美国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不久的50年代初构筑的封锁中国的贸易壁垒，踏上了重返国际市场的历程。当然，2001年加入世贸组织（WTO）中国才真正重返世界市场，然而就一定意义上说，这个进程最重要的一步是中加粮食贸易（甚至是起点）。

在动员加拿大及其他国家的商人与公司同中国贸易的过程中，汉密尔顿很快发现这些商人与公司推而不动的根本原因是美国孤立与封锁中国的政策，特别是受《美国与敌对国家贸易法》

(The United States Trading With the Enemy Act) 的阻碍。1964年3月第一次访华后，汉密尔顿受周恩来委托，积极调解中美之间的关系，为冻结的中美关系的松动发挥了作用。中美关系的松动以及长期小麦贸易准备的基础，终于促成1970年中国与加拿大关系正常化。加拿大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为中国唯一合法政府则开创了70年代西方（包括美国和日本这两个当时最敌视新中国的国家）与中国建交的第二次高潮，中华人民共和国最终重返国际社会。因之，中加小麦贸易的政治意义也不容低估。所以，小麦贸易对中国重返国际政治舞台以及汉密尔顿在其中所起的作用，是本书研究的又一重点。

最后，叙述中国改革开放初期汉密尔顿是如何推动中加和中美两国走向更高阶段的经贸合作，以及汉密尔顿能够为中国的事业而奔走的原因。

的确，阿尔文·汉密尔顿是为数很少的、朗宁式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位老朋友。不同之处是，郎宁在新中国建国前后通过与黄华、董必武等中共领导人交朋友，以及通过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这样的半官方机构与中国人民建立了友好关系。汉密尔顿主要通过政府职能部门和中国人民对外贸易促进会，在与中国的长期的贸易交往以及帮助解决中国实际经济问题的过程中，成为了中国人民的朋友。而且，无论在冷战年代，还是在中国改革开放的和平环境中，他与中国的交往都产生了实质成果，与中国人民的友谊持久弥坚，直至晚年仍为中国的改革开放事业奔走。这个时期中加两国政府都很重视他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老朋友的特殊地位。1984年加拿大进步保守党布赖恩·马尔罗尼（Martin Brian Mulroney）政府成立，虽然没有吸收他的这位老首长入阁，但并没有忘记他与中国的特殊关系，1986年还请他代表加拿大农业部长率团访华，利用他在中国的影响扩大交往，增加加

拿大在中国的商业机会以及其他利益。

总之，阿尔文·汉密尔顿从20世纪60年代到80年代与中国有长达二十多年的交往。由于他在加拿大和北美政界、商界的地位和影响，研究他在这一特殊时期与中国的关系，实际就是研究中西经济贸易的历史。他为推动中加两国恢复贸易还介绍其他国家包括美国的商人与中国做生意，还为此调解中美关系这一政治关系。可见，20世纪60年代中加粮食贸易是一个很有现实意义的研究课题，应当深入研究，从中我们可以总结出不少缓和国际关系与维护世界和平的经验与教训。

这个研究课题所依据的材料有：

加拿大魁尔夫大学（Guelph University）政治学系的帕特里克·库帕教授（Patrick Kyba）根据当时尚未解密的档案，为汉密尔顿先生写了一本政治传略《阿尔文：阿尔文·汉密尔顿阁下传略》（Alvin: A Biography of the Honorable Alvin Hamilton, P. C.）。该书除使用汉密尔顿的档案文件外，对传主进行过采访，留下了口头史料，是非常宝贵的回忆材料。这部分材料也涉及粮食贸易，对本专题研究非常有价值。2000年访学加拿大时，我访问了汉密尔顿先生，也计划做口头史学工作，主要就他在美国对中国采取严密贸易封锁的条件下推动小麦贸易以及帮助中国返回世界市场的历史问题，做些补充采访。很遗憾的是，汉密尔顿一开口，我大失所望。我说：“想了解60年代中加粮食贸易的情况。”他却应声答曰：“噢，我驾飞机，从缅甸把粮食运送到了中国……”然后，念念有词，“My Brain's short.”，即脑子短路，出了问题。他可能患了脑萎缩之类的疾病，不能正常交谈了。一个星期之后访问他长子时，得到了证实。这样，我的计划就落空了。所以，库帕教授80年代初留下的口头史学材料就很重要了。

另外，那次访问还想阅读汉密尔顿私人档案（也被称为 Manotick Papers）的计划，也因此放弃了。他儿子告诉我们，汉密尔顿得病后，这部分档案便被移藏于国家档案馆。根据以往在那里阅读材料的经验，要想在我访学结束回到中国之前读到这批档案是不可能了，只好留待他日了。回国之前，我还是把这件事委托给了加拿大外交部历史档案处的一个朋友，格雷格·唐纳赫（Greg Danophy）博士，希望他能替我找到这批档案材料寄给我，后来他说没有找到。由于汉密尔顿退出政界后经常在家中接待中国贸易和使馆官员，我认为这部分档案一定包括这方面的材料。

在去马诺蒂克之前，我已经用了整个夏天在加拿大国家档案馆系统地阅读和收集汉密尔顿与中国的有用材料。由于库帕教授的著作提供的线索，我在做这个工作时省去了不少的麻烦，只是这部分档案从外交部历史档案处移交国家档案馆后，又重新编档了，查找也颇费一番工夫。在这里，我主要搜集加拿大国家档案馆内阁枢密院的档案以及汉密尔顿文件（Hamilton Papers）中他在农业部时期以及 20 世纪 60—80 年代有关中国的其他材料，特别着重于那些被库帕教授出于他的观点、立场以及著作重点所忽略了的材料，例如，在中加粮食贸易和纺织品贸易中，大量有关贸易争端的材料。我所收集的内阁档案材料，主要涉及加拿大政府关于粮食贸易及两国其他贸易问题的材料，例如，涉及中国商品进入加拿大市场的政策、小麦贸易所涉及的加拿大与美国经济关系等问题的资料（往往是为了规避《美国与敌对国家贸易法》发展对华贸易），以及进行内阁讨论与决定的材料。我在档案馆里的时间主要花到搜集关于后面这些问题的材料上去了，因为这些材料是我的研究课题突破的关键。我认为，从中可以总结同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打交道和贸易的经验与教训。在中国已融入全球